

经典作家

纪念

路遥

诞辰七十五周年



- “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
- “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才可能使自己的劳动有一定价值。”
- “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会成功。”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出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1年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热爱生活、潜心创作的自觉，连同那些滚烫的句子，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里激起波澜。

今年是路遥诞辰75周年，本报特邀路遥生前好友曹谷溪，《路遥论》作者、学者杨晓帆撰文，用有温度的笔触，讲述那些关于路遥的故事。让我们跟随作者的文字，去倾听那些历史的转轨与细节的慢放，走近作家路遥。

——编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陕西人艺话剧《平凡的世界》上演，王沐冰编剧，管晓松导演



电影《人生》海报，路遥编剧，吴天明导演，1984年上映

本专刊由《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

“高加林难题”带来的思考

“谁人不是高加林，谁曾不负刘巧珍”——恐怕是大多数读者未必说出口的一句心里话。每位读者在阅读《人生》时都有基于不同历史经验的代入感，但总难免以这样矛盾的态度打量高加林和我们自己。一个“负”字标举了良心，是在现代版陈世美故事里表达忠贞与责任，在追求个人实现的价值版图里留存自我审视，将高加林与我们切割，把他的“命运悲剧”归结于“性格悲剧”。但“谁人不是”，又预备好了某种自我开脱，是共情于令高加林不平的社会现实，是以经不起考验的人性为名，带着告别纯真的伤感 and 一点犹豫与悔恨，在“正确”计算得失后，作出人生选择。

四十多年过去了，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难题”仍在，并且不再是专属农村青年的进城故事。在一本有关“小镇做题家”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中，作者谢爱磊就在前言部分提到了路遥。如果说在《平凡的世界》所勾勒的奋斗故事里，“物质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的幸福是克服身份制约、实现社会流动的双重注脚。如今，社会面貌和阶层跨越者的流动故事又是另一番图景。物质方面的进击并不一定带来精神的富足。”研究者注意到，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名校生虽然看似靠“学业”实现了向上流动，经济上基本自足，却仍然承受着难以融入的情感压力，面临着持续“改造自己”的焦虑。他们都在以一种或或谎、或无奈的方式，续写着高加林的故事。

这种“不过时”，首先当然是因为路遥着意于“寻找生活中矛盾冲突比较尖锐的部位”。他用“社会的断层”一词形容转型期的中国，“旧的正在消失，新的正在建立。消失的还没过去，建立的也还没建立起来”，“不论生产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意识都处于过渡、转折、斗争、矛盾的这种状态”。这也是路遥所说“交叉地带”的涵义。《人生》看起来只是一个由爱情抉择生发道德训诫的故事，但其实有更丰富的内涵。

《人生》题记引自《创业史》，但柳青笔下改进了城支援工业化建设与诞生宝扎根农村互助合作最终达成的矛盾统一。在《人生》中再度被还原为未解的“悬树难题”：是农村知识精英流失与本土转化的困境，是如何消灭三大差别，改变传统名教观的难题。当高加林以权谋私让儿子顶替了高加林民办教师的位置，当高加林到城里担任民办教师张克南的妈妈言辞侮辱时，《人生》开篇就写出了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路遥明确说要“给习惯了看好人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路遥一面看到了高加林渴求自我实现的合理性，一面又为他“于连式”近乎以恶抗恶、迫切从生养他的土地上剥离出去的野心感到不安；他召唤保尔·柯察金式的崇高精神，想要以巧珍“金子一般的加林”与德顺老汉关于劳动的教喻“稳”住高加林，但又在高加林最终带着内疚之心返乡的结尾一章标题下注明了“并非结局”。虽然《人生》首先表现的是1980年代初农村的改革，但其意义更在于揭示立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动力机制与实践、理想之间存在的冲突。

除此之外，新的时代感觉得在发明新的读法。如今再看高加林寻求自我实现的道路，问题倒不是“走后门”，而是挑战既定模式的竞争。《人生》中频繁使用了将在在装扮与身份意识关联的人物塑造法。比如高加林被迫回村劳动时，刻意穿上身最破烂的衣服，拼命把自己“化装”成个农民。路遥这样写，是为了突出高加林与农村格格不入，让人思考乡村现实无从改变高加林对高级岗位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当路遥写到高加林希望巧珍穿上那件米黄色的确良短袖，用一块红头巾把巧珍“装扮”成一张外国画上的漂亮姑娘；当高加林进城之后，又不必须按照黄亚萍的审美观点被“打扮”一番，穿上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和天蓝色裤子筒裤，提前“实习”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即便路遥只是着眼于恋爱中的关系，也在必须以物质标识身份等级、文化趣味的无意识中，写出了“脱不掉的出身”。高加林的雄心勃勃打破了城乡区隔对个人向上流动的限制，但他最终只是从生活的外形上占据了“一个城市中的位置”。

相较路遥写作《人生》的1981年，如今，各类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乡村振兴战略凝聚返乡乡人等现实状况的改善，似乎足以以支撑高加林们走出不一样的道路。而我们并未摆脱高加林引发的不安与困惑。路遥不仅凸显了单一依赖经济主义逻辑、着眼于“发展”的制度设计并不能完全解决精神治理方面的问题，路遥在《人生》之后对高加林命运的“重写”与追问，也为我们留下了路标，如何在时代中活出不同的人？

从“普通人的道路”到“世界之路”

关于《平凡的世界》题目的由来，有着三种说法。一是《黄土·黑金·大城市》，对应路遥原定写作计划中孙少平进城的路；二是海流回忆路遥原本借用他的题目《走向大世界》，但觉得太过张扬，不如“平凡的世界”平稳、大气；三是《平凡的世界》卷一26—28章曾初刊于《延河》，编者按“称其节选自长篇小说《普通人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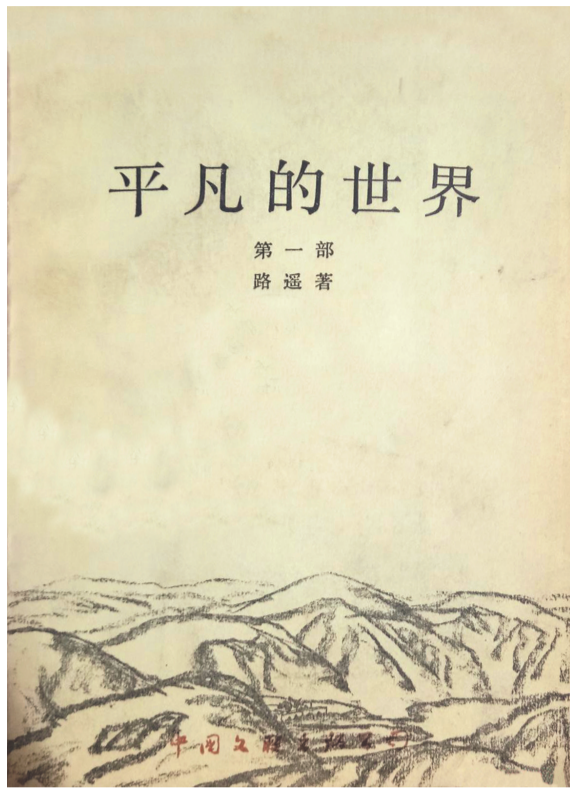
重心落在“平凡”与“普通”上，俨然起始与《人生》不同的基调。一方面如孙少平所说“普通人并不等于平庸”“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路遥在孙家兄弟身上开展出了与高加林截然不同的生活哲学。另一方面，套用巴赫金关于成长小说的理论，“人在历史中成长”。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进程，“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点上他身，是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平凡的世界》一边廓清1975至1985这十年之间的社会变迁，一边写新人的成长问题。新人所具备的素质因而不仅仅是作家理想观念的投射，更来源于现实本身内蕴的自反性力量。

可以从许多角度谈《平凡的世界》对《人生》的改写。其中一个关键一点是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高加林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在他实现自我价值的进城道路上，使用一种理想，为一种精神，而带着青春激荡。”虽然路遥没有写成小说，但在《人生》同期涉及青年题材的作品都在探索这种罗曼蒂克精神的构成及可能。

《在困难的日子里》副标题是“一九六一年纪事”。在

人在历史中成长

□杨晓帆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路遥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12月



《人生》，路遥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1月

的沿用，作者意在为高加林的反抗增加合理性；孙少平失去教职务回家种地，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各奔努力不足，学生服义务农，隐含了农村改革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可能造成新问题这一重要历史信息。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并不急于在文明与愚昧的新启蒙话语中审视乡村，从中确立人物命运和现实生活如是发展的可信性，小说中的历史回响和价值信念就是作家一脉相承的道德教喻。

而《平凡的世界》要突破的正是这一点。这也是“柳青传统”之于路遥的意义。能否像柳青一样一手拿着显微镜，一手拿着望远镜，将对生活细部的逼真描绘与史诗式的总体性追求结合起来，将某个人物人格理想的描绘与社会整体性发展的勾勒关联起来，这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风格问题，还决定着“寻找罗曼蒂克”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还是可以经由对现实感的重构，去真正改变个人与世界之间伦理和行动的关系。

同样，尽管孙少平代表了对于乡土社会的背离，但路遥也始终强调家庭以及底层出身之于孙少平成长的意义。例证卷一25章写到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知识启蒙，当他在阅读的精神愉悦中感到阶层束缚时，父亲孙玉厚突然找回来，这次回村去西渡麦，需要少平回家添一份劳力。正是这一次回村遭遇“抢救事件”，把孙少平从个人的精神慷慨转移到与同村人休戚与共的命运上来。而少平为自食其力和供养妹妹上学成为一名矿工，更逐渐翻转了最初与田晓霞之间被启蒙者与启蒙者的关系。田晓霞原本认为生活必然不断驱策精神追求，孙少平却反过来“教育”了她，“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俗生俗活，但又竭力使他们自己已有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孙少平“苦难哲学”的核心是劳动，就像孙少平的“劳动”致富，并非仅仅是物质匮乏之中的励志或隐忍，也不是核算劳动报酬后对自己的定价，而是通过劳动去“具体的生活”，去体现芸芸众生的平凡却伟大的努力，再从中确定自己的尊严感与自豪感。当孙少平对妹妹说出“永远不要娶我们的出身”时，《平凡的世界》完全扭转了高加林证明自我价值的方式。高加林的世界要么是他的负累，要么是有待征服的领地，孙少



1970年，路遥（左）与曹谷溪在延安关古渡前

我的挚友路遥

曹谷溪

从我认识路遥到他去世的20多年里，路遥在我家里生活的次数比在自己家生活的次数还多。

有一年，大年三十那天，他和妻子林达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和他的大妈一起过年。按陕北的乡俗，正月初一是不出门的。可是，路遥从来不按套路过年。正月初一吃过饺子，就骑自行车带着林达来到我家，一来就走了。

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1975年我也从延川调到了延安。每逢周日，他常常来我家吃饭。后来他分配到《延河》编辑部工作，那阵子编辑都很穷困，他到延安的出差吃住都在我家；后来他当了专业作家，来延安地委以安排住宾馆，但路遥不爱吃宾馆的饭，每天中午11点左右就上我家来了，我们家的饭小菜、小调料比较多，他已经吃习惯了。

1970年，我和路遥在延安关古渡前照的这张照片，是诸多报刊、电视台发表最多的一张照片，也是路遥最喜欢的一张照片。那时我29岁，路遥21岁。两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以黄河大峡谷的万年岩层和滔滔黄河为背景留影，应该说它包含着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

这是一张自拍的照片。有人说那照片是路遥站好后，由我支起三脚架拍的。1970年，我还没有奢侈到拥有三脚架的地步。我们用几块石头垒起来个台子，高了就折下去一块，低了再整上一块。路遥站好后，我赶快走了自拍快门。

1992年9月5日，路遥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转到西安京医院治疗。转院前夕，路遥特意要我将那张合影放大一张给他。这张照片陪伴他走完生命里程中的最后71天。

扛着“优胜红旗”走向全国文坛

还记得，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曾与上海的主持人曹凡闲聊说：“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不写小说，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时候。”其实，路遥后来自《山花》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优胜红旗》的短篇小说。这篇《优胜红旗》在《陕西文艺》创刊号选用。路遥就是扛着这一面“优胜红旗”，一步步走向全国文坛。

论年龄，路遥的母亲年长我8岁，我又比路遥大8岁。大概就是20岁左右的时侯，我认识了路遥。他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陕北后生，初涉文坛，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是他酷爱读书，刻苦学习。终于从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专业文学创作者。20世纪80年代，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塑造了马延福这样一个坚定的官员，应该说这是路遥第一次获奖。随后不久，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继而又改编成同名电视剧，许多人预言路遥不可能再有作品超越《人生》，路遥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一定要超越自己，所以他用了6年功夫写出了百万字学的文学巨著《平凡的世界》。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路遥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但他活着的时候拍摄的影像资料很少。只有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敏拍摄过30多分钟的影像和录音，分别用在诸多电视剧片之中。

和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平们一起生活

路遥确实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对整个社会人生充满斗志；路遥是个很强的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放弃了自己的一切许多事情。他说人生不可能都是完美的，一定会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是一个参与意识很强的人，但是他选择的事，决定了他必须孤独地生活在虚构的梦境里，和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平和田晓霞们一起生活，一起说笑，一起梦幻，一起流泪。

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做的准备工作非常扎实，他翻阅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和《延安报》。这十年间，延安出了什么事，世界有什么事影响这块土地，他都要了解。路遥翻阅报纸得手不释卷，还接着用手背翻书。

路遥曾在铜川煤矿、榆林招待所、延安宾馆创作这部小说，最后在甘泉县招待所完成了全部的创作。他不对我说，但并不是所有评论家都持这个观点。曹谷溪曾对我说：“谷溪，我读了你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以为你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完成了《平凡的世界》。他在写作路上是非常孤独的，对待自己的病，也是一条好汉。路遥患有肝硬化腹水，疾病逐步恶化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他忍着剧痛完成了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作品完成的时候，体力也近乎耗尽了。”

文学是否还能够通过我们透视现实的眼光，照见“人”的可能？路遥是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他获得了“改革先锋”的称号，是一位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

（作者系路遥好友、延川《山花》创始人）

《平凡的世界》手稿